

“抗战”时期迁渝“海派”与西南美术的发展

蔡 敏

“抗战”时期,大批的高校艺术院系与画家迁往重庆,使之成为当时全国的艺术中心,其中尤以“海派”画家最为引人注目。他们通过创作、举办展览及教学等活动,“海派”绘画已经深深扎根于大西南,为当地美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对当地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南地区的艺术风貌,是中国美术史上值得回顾和深入研究的重要事件。

1. 迁渝进程

“抗战”前,重庆作为西南中心地区,环境闭塞,受新兴艺术浪潮的冲击较少,艺术家整体力量薄弱,艺术发展相对落后。“抗战”期间,重庆成为“陪都”,随着国民政府和一些机构的迁入,大西南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社会文化,包括美术都发生巨大变化。高校美术院系与画家的大批迁入以及频繁的艺术活动,使重庆成为大后方的美术中心。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几所重要的高校美术院系先后迁至重庆。最早的是中央大学艺术系,这是当时国内的最高美术教育机构。南京沦陷前夕,中央大学艺术系随校迁至重庆沙坪坝,西迁教师中的“海派”画家有徐悲鸿、吕凤子、张书旂等。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在这一时期辗转移至重庆,其中的“海派”画家有潘天寿、谢海燕、吴弗之等。另外一些高校美术院系也陆续来到重庆,如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等。这一时期还新办了不少艺术院校,最著名的是正则艺术专科学校,由吕凤子任校长。这些艺术院校是当时艺术教育与创作的核心,它们在大西南少则三四年,多则七八年,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

随着美术院校的内迁,大批学院派画家来到大西南,不少学院外的画家也蜂拥而至。在战事的逼迫下,他们大多是举家内迁,寓居重庆等地,短则二三年,长则近十年,为西南美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内迁重庆的画家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绘画风格的画派,如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等,但以徐悲鸿、潘天寿为首的“海派”画家群体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在重庆相对安宁的环境中,或潜心创作,或以画笔为武器投入到抗战宣传的洪流中,或在艺术教育上锐意进取,

培养了大批的优秀艺术人才。他们举办画展、卖画自给、结社互助,交往密切,以“海派”绘画独特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抗战保国。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家在这里写下了他们艺术生涯难忘而独特的一页,写下了中国美术史上的辉煌篇章。

2. 艺术影响

迁渝“海派”画家在重庆期间于艺术创作、宣传与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美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西南地区影响深远。

第一,这一时期,“海派”绘画出现了一次艺术创作高峰。“海派”画家将抗日救国的情怀化为艺术创作的动力,涌现了大量的画作,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远超前一时期。艺术成就较大的海派画家当推徐悲鸿、潘天寿、张书旂、吴弗之等。徐悲鸿这一时期的创作,继承了海派的笔墨,融入了时代特征,写实而富于文学韵味。在他的笔下,“海派”绘画的吉祥寓意转变成了令人振奋的民族精神。如《负伤之狮》以东方睡狮来暗喻旧中国,并赋予丰富的内涵。雄师回首翘望,包含着无限深意,表达了画家的爱国情怀。雄狮虽负伤,但双目怒视,蕴藏着坚强的力量。在绘画艺术风格方面有很多的探索与创新。战争对柔美的、风雅的和个人主义伤感的抒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的,一些一向清高的艺术家在民族危机时,社会意识有所改变,“海派”画家的审美心态与追求也随之转换。抗战时期的美术在形式语言上不太关注曲线美,也不推崇静态的表现,而是崇尚表现“力”、“奋进”或者“抗争”的视觉语言和寓意硬朗的作品。在内容上,提倡的是反映战斗的、生活的题材。通过表现战斗和生活的作品,表现民族的抗争的意识和民族复兴的理想。这些特点很多一直延续下来。

第二,这一时期,相对安定的环境、美术机构和美术家的大聚合,为艺术交流和创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画家或进行艺术展示、或鬻画谋生、或义卖赈灾等,美术展览很盛行,仅重庆一地,举行的画家个人展览就达一百三十多次。时人因而感慨:“雾季的山城,一切都活跃了起来,尤其是美术方面,今天东一个展览会,明天西一个展览会,简直弄得人眼花缭

乱，应接不暇。”（钟树梁《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海派”画家是其中的主角，如徐悲鸿、丰子恺、陈之弗、潘天寿等，都在重庆举行过个人画展。1943年3月18日，“徐悲鸿画展”在中央图书馆开幕，共展出国画、油画、素描两百多幅，其中包括大量国画作品，如《灵鹭》、《逆风》、《奔马》、《风雨鸡鸣》、《晨曲》等具有“海派”绘画艺术风格且有浓郁的时代感和民族特色的绘画作品，每天的观众达万人之多。除个展外，美术社团的展览也很频繁，尤以中华美术会为多。该会积极筹备美术展览会，开办美术培训班，编辑美术刊物，编辑连环画和举办街头展览等。画展是展示和传播艺术的重要渠道，参观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和当地的美术爱好者，通过各种展览，他们认识和了解了“海派”。

第三，艺术院系是艺术传承的中枢，即使在动乱的年代里，这里依然是艺术教学和创作的主体。抗战期间，重庆主要的艺术院系是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国立艺专这两所公立艺术院校，潘天寿、张书旂、徐悲鸿、吕凤子、吴弗之、张振铎等大多都在这些学校主持工作或教学。他们结合实际，积极改进教学内容与方法，并形成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强调中西结合和以潘天寿为代表的、强调传统绘画体系的两种教学风格。吴弗之、谢海燕、张振铎、诸乐三等遵照潘天寿的教学方法，推行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的分科教学，强调国画教学的独立性，强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博采众长不拘一家。这些教育思想与方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如李际科、苏葆桢、何方华、毕晋吉等先后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国立艺专，受教于前述的大家。其中潘天寿对李际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书旂、徐悲鸿、吕凤子对苏葆桢等画家也有重要的影响。

3. 社会影响

通过“抗战”时期的努力，“海派”绘画已经深深扎根于当地，对大西南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艺术风貌。同时，“海派”艺术自身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第一，在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人才，他们秉承“海派”风格，传道授业，为当地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抗战”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来到重庆接受艺术教育，成为美术工作者，战后很多人选择留在当地，其中的佼佼者包括李际科，苏葆桢、何方华、毕晋吉等。如李际科原籍安徽休宁，“抗战”时期辗转来到重庆学艺，在潘天寿的指导下，以“海派”笔墨为基础，本着“师造化”的精神，对张书

旂、吴昌硕等画家的作品进行了临摹学习。他的写意花鸟，有些作品学习了潘天寿的构图、气息和用色，浑厚大气。他深入生活，创作描绘农村场景的作品，富有生活气息。何方华原籍山东菏泽，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受教于徐悲鸿、吴作人、张书旂等。他继承“海派”传统，花鸟画取材广泛，清新自然，富有时代生活气息，简练中见丰富，充满生动活泼的感情和乐观健康的精神。通过他们薪火相传，“海派”的学脉得以在大西南延续。

第二，通过移植与涵化，“海派”风格成功地占领大西南的艺术领域，同时，当地的文化土壤与社会风貌也促使“海派”改变，在创作风格、形式、内涵诸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题材和寓意方面更为贴近下层民众，更富生活气息。如农村的鸡舍、鹅群、丰收的果实、路边的野草、盛开的油菜花等成为绘画的主题。在表现技法方面，保留了“海派”的特征，同时大胆运用民间绘画的色彩与技法，这在战后至今的重庆画家的创作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在艺术风格方面重视雅俗共赏，吸收多种风格，富于鲜明的时代感。

另外，迁渝期间，“海派”画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体验，这为他们的艺术创作及“海派”艺术的发展促成了巨大的转变。“海派”原本是生长于繁华富庶的现代都市，充满小资情调。而当国破家亡，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暂避于山城，进入富于乡土气息与民族特色的大西南，生存土壤为之一变。个人的生命的体验经历了革命式的转变后，艺术创作的动力与源泉也随之改变。因此，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海派”画家在战前与这一时期绘画的风格、内容迥然不同，而这一时期也成为很多画家一生的财富。

“抗战”以来，西南的绘画艺术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获得飞跃发展，其成就远超以往。追根溯源，“抗战”时期“海派”画家走进封闭的世界重庆，对于西南地区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迁渝后，“海派”画家自身及整体艺术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移植与涵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类似事例并不是孤立的。因此，迁渝“海派”与西南美术的发展，无论模式与路径都具有典型性，这是这一个案的学术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 韦平